

未名译库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保罗·吉洛伊

朱迪斯·巴特勒

霍米·巴巴

皮埃尔·布尔迪厄

斯图亚特·霍尔

# 文化研究的用途

[英] 安吉拉·麦克罗比 著 李庆本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

#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A Textbook

# 文化研究的用途

[英] 安吉拉·麦克罗比 著 李庆本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6-465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的用途/(英)麦克罗比著;李庆本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2

(未名译库·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

ISBN 978-7-301-12895-4

I. 文… II. ①麦… ②李… III. 文化—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948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Angela McRobbie, 2005

书 名: 文化研究的用途

著作责任者: [英]安吉拉·麦克罗比 著 李庆本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895-4/I · 19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 18.75 印张 196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

文化研究的用途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顾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

“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 译者序

从 1958 年霍加特出版《识字能力的用途》到麦克罗比 2005 年的《文化研究的用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前者被视为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而后者则可以看成是对文化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有意思的是，二者都将“用途”作为书名的一个关键词，这是很可以说明文化研究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旨趣的。相对于 20 世纪欧美的形式主义、符号学、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强调文学艺术的文本性、自律性，文化研究显然是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社会与大众。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已放弃了精英主义的立场，也不再在意经典作品在构建欧洲文化身份中的价值，更不关心其学科的归属性和规范性。诸如大众、阶级、权力、族裔、性别和媒体等问题则成为文化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有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宿命。那就是，尽管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其草根性特点，但它却仍然摆脱不掉向体制内运作的倾向。这种倾向从霍加特于 1965 年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就开始显露出来，而麦克罗比在撰写《文化研究的用途》的时候，更加明确地将其定位于大学教材。这说明文化研究虽然面向大众，但它的立足点则仍然要借助于大学。尽管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2002 年遭到校方的封杀，但文化研究显然已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文化研究的用途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生”,由伯明翰大学所点燃的这把文化研究的野火不仅仍在英国学界(如戈德史密斯学院、开放大学)继续蔓延,而且也蔓延到北美、澳洲,更于20世纪90年代蔓延到了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目前英国伯明翰学派早已成为一面旗帜和一个符号,它的意义早就超越了伯明翰这一所大学。但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知识场所仍然是在大学和知识界,这大概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这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仍然在于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这当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至少对于麦克罗比是如此的。她的这本书不仅明显是一本教材,而且还明显地将文化研究的用途定位于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上。本书导论部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文化研究在今天之所以有价值,就是由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改造世界当然是一项更伟大的工程,但对于一位在大学做教职的人来说,他或她首先要做和能够做的当然还是认识世界。文化研究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使我们有可能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有可能关注日趋纷繁的大千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读书人的认识世界当然有读书人特有的期许和特有的方式。尽管文化研究缺少明确的学科定位,但既然是学术研究则依然要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性。我看好的理由就在于它能以读书人特有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换句话说,《文化研究的用途》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将文化研究体制化的任务,它成为我们今天在大学做教职的人可以操作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教师的角色所具有的“特权和快乐”吧!

作者麦克罗比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她的《后

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一书曾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化研究的用途》一书是她为英国大学生撰写的一本教材，也被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莱瑞·格罗斯伯格称之为“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材”。本书重点选取了作者认为当前文化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六位理论家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他们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分析了他们对文化研究的成就，揭示了如何将他们的理论运用到当代大众文化的分析之中。书中涉及当前许多文艺现象，如北美的离散音乐、艺术家因卡·索尼巴尔的作品、包括《穆赫兰道》、《芳龄十三》、《特德老爹》在内的许多影视作品，以及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等，表明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的内在联系。

本书分为导论、六个章节和两个补充材料。导论部分介绍了作者写作这本教材的缘起及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介绍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独创性与开放性，集中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的现代传媒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撒切尔的“权威民粹主义”的分析，以及世纪之交霍尔所提出的“多元文化论”。在第二章中，作者用“黑与不黑”的双重意识来描述吉洛伊对种族现代性的批判，揭示了吉洛伊站在黑人角度反对种族话语历史权力的必要性、吉洛伊对超越种族对立的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以及他从乔治·克林顿的放克乐队所演奏的黑人乡土爵士乐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第三章是作者对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比较文学教授朱迪斯·巴特勒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分析及论述，内容包括巴特勒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质疑、对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理论的修正，以及巴特勒最著名的“性别述行理论”。在第四章中，作者分析了美国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

---

文化研究的用途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物霍米·巴巴与文化研究相关联的理论,其中包括巴巴对从阶级到社群的政治发展过程的描述、巴巴对后殖民媒介和文化翻译的理解,以及巴巴对种族刻板印象的剖析。在作者的眼中,巴巴首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关心的是概念、过程和想象的运用,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巴巴所提出的许多令人费解的概念术语,如“第三空间”、“移向界外”、“时间间隔”就必须在巴巴著作的上下文中采用小说家的想象力来加以理解。第五章探讨了布尔迪厄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尽管布尔迪厄因为文化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过于庞杂,因而对文化研究充满敌意,但作者仍然认为他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此,作者首先分析了布尔迪厄的“场域”和“惯习”这两个概念对于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其次分析了布尔迪厄通过“趣味”这个概念是如何觉察到消费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复制社会不公德重要场所的,此外,作者还分析了教育在文化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和新文化媒介的功能。在讨论詹姆逊的第六章中,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政治的理论的分析上,分析了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过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如何对当代传媒、影视作品产生影响的。

本书在每一章后都有一个附录,讨论的是与每一章的理论家的文化理论有关的政治、大众文化或艺术个案问题,其实就是作者采用每一章的理论家的理论对文化、艺术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的一种演示。此外,本书还有两篇评论文章,是对布尔迪厄等人 1999 年写的《世界的负担》和巴特勒 2000 年写的《安提戈涅的要求》的评述。

本书的创新性表现在:首先,作者在总结和描述文化研究理论时,并没有泛泛而论,而是选取作者所认为目前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六位理

论家的理论加以重点剖析，借此凸现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其次，作者能够突破门户之见，除了介绍霍尔和吉洛伊这两位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理论之外，还介绍了并不属于英国伯明翰学派但同样对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理论家巴特勒、巴巴和詹姆逊的相关理论，而对于法国理论家布尔迪厄，虽然他反对文化研究，但由于他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所以作者也将他的理论置于考察的范围之内。此外，作者在阐述每一位理论家的理论时，总是能够做到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使得本书的理论研究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例如，在论及朱迪斯·巴特勒的章节中，作者先是介绍评析了巴特勒对女性主义提出的挑战、对心理分析做出的修正及她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理论，随后在附录中分析了美国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的电影《芳龄十三》(*Thirteen*)。在对电影的解读中贯穿着巴特勒思想的一个主题——即“被女孩化”。13岁的女主人公在成长的过程中遭遇的对同性朋友的依恋、莫名的愤怒、各种疯狂的行为等等，都残酷地显示了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充满着各种的危机和可能。电影印证了巴特勒的观点：在塑造个人社会性别过程中(在这里是成为一个女孩)，需要排斥很多社会不认可的、不符合该社会性别应该拥有的特质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同性恋；这样的过程是强制性的，排除了很多人格发展的其他可能性。电影对片中女主人公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毫无缘由的愤怒保持着一种不确定性，作者通过巴特勒的理论，看到了电影中这种模糊的愤怒就是设置某种标准的女性气质特征要求所产生的强制性后果。这无疑很具象地阐明了巴特勒颇为艰深的学术理论，让读者看到了巴特勒对性别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等相关领域研究所带来的极具开放

文化研究的用途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性的思想指引，同时也让读者对这部看似简单的青春期成长电影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最初知道这本书是在圣哲出版集团的新书预告上。当时我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工作。尽管暂时脱离了大学的环境，但还是无法忘情于文化研究所散发的学术魅力。这本书于2005年5月正式出版，我是通过马耳他大学的一家书店订购了这本书，并于当月就拿到了它，应该说是比较早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渐渐萌生了翻译的念头。我的这种想法得到了王宁教授的支持，他认为很有将此书介绍到国内的必要。书里所选的六位理论家的理论是我所心仪的，而他们的文化理论又是那么地具有挑战性，所以本书首先为我们了解他们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途径。例如，斯图亚特·霍尔在我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实在过于繁杂，往往使初学者望而却步。而这本书则告诉我们哪些是霍尔最主要需要把握的东西，使我们知道霍尔本人学术历程的全貌，使我们知道他不仅仅在大众传媒理论中的建树，而且还在其他领域（如多元文化问题和政治批判撒切尔主义）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繁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所采用的方法是先研究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位理论家的著作，然后在此基础上来进行翻译。而这个工作的完成需要译者付出比一般翻译某一位理论家的专著更多的心血，也自然增加了翻译工作的难度。对于一些关键术语，本书尽量采用国内通用的翻译，而对于译者认为国内一些错误的翻译，则予以校正。如对于巴特勒的述行性这个概念，国内翻译为“表演”或“操演”，但根据译者对巴特勒原著的研究，这种翻译并不符合巴特勒的原意，也与作者麦克罗比对巴特勒理论的理解相去甚远。实际上，巴特勒

的这一概念来源于奥斯丁的言语理论。在奥斯丁那里，语句被区分为述事句(*constatives*)与述行句(*performatives*)。所谓述事句，即指陈述一个非真即假的事实；而述行句则用于完成某种特定的行为而不是用于陈述或报道某种特定的行为。巴特勒认为“这是一个女孩”就是一种述行句，它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主要是完成某种特定的行为。当一个孩子降生时被宣布“这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在巴特勒看来，这种宣布本身就含有希望这个孩子按照女孩的机制来成长这种行为。所以她说：“性别不是名词，她是述行性的，即，建构它声称要成为的身份。”(见本书第99页)基于此，译者将“*performativity*”翻译为“述行性”。

书的大部分翻译是我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回国后，我将此书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班的教材讲授，在此过程中，研究生班的学员为此书的翻译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完稿后，张伟、韦玮、张飞龙、武桂杰、张晓玉、韩女子、崔连瑞、闫亮、张晓玲、李楠、李萍、陈小龙等帮我校对了书稿，更正了许多错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秀芹教授、于海冰博士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作者麦克罗比教授专门为此书写了序言。借此机会，我要对所有为此书的出版提供过支持和帮助的人致谢。此书也是我所主持的北京语言大学科研规划项目(06GH05)的阶段性成果。书中错谬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李庆本

2007年9月26日

## 中译本自序

能为《文化研究的用途》(*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A Textbook*)一书之中文版书写序言,我感到莫大的荣幸。首先我要向该书的译者李庆本教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促成了该书的出版。虽然在其副标题中,该书被命名为一本教科书,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一个全面的和介绍性的论述;它也没有清楚详细地说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英国文化研究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在写该书的时候,我考虑到已经出版了很多常规教科书,它们都全面地、以易于学生理解的方式描述了文化研究的历时发展路径——通常始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著作,随后是20世纪70年代末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著述,之后是世界范围之内关于文化研究的各种论争,关于性别和身份、种族和种族划分、后殖民理论、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全球化问题、“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局势、打破跨文化主义的预言和帝国的重新出现等等问题,这些论争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被提到最重要的位置。

鉴于已经有太多的注意力投向文化研究的英国性(Britishness)传统和类似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神话(mythology)的东西,我开始着手

文化研究的用途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写《文化研究的用途》一书。这并不是对那些年轻学者(他们在文化领域内为发展学术研究新途径而提供了有价值的学术范式)不怀感激之意。而是要表明国家框架(national frame)现在只能作为批评性论争的一个主题。任何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工作起点,现在都必须是对以下问题的一个质询——即国家想象是怎样产生了一个文化支配领域的;这反过来又包括了广泛的制造界限的实践活动,其后果影响了我们怎样理解和体验民族国家,及其他所有民族的和跨民族的格局;比如旧欧洲、新欧洲、南方和北方、第一、第二和所谓的第三世界。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早期的开创性著作正是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界限之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强有力的和精确的分析。斯图亚特·霍尔也创造了类似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质疑了英国性的问题,首先是通过他与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著作进行的批评性论战,随后是霍尔从他们的关注重点转向英国文化论争中边缘的而非中心的兴趣点上。斯图亚特·霍尔的著作在本书中也有大量涉及。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霍尔一直具体关注他者的特征问题(the styles of otherness),这个问题挑战了主流文化以及英国战后工人阶级保守主义的图景。他通过描写关于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黑人风格特征、音乐等问题来进行这项工作。霍尔还以明确的姿态关注着西方欧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著作。同时,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霍尔一直持续保持着这样一个强烈的兴趣中心——将英国政治体系作为一个契机,用来近距离地探讨“社会”不同层面是怎样与其他层面(经济、政治和文化)交互发生作用的,在这些层面中始终存在着统治团体为了维持稳定和获得共识所进行的斗争。当事情似乎要被拆解,当从属力量获得了某种优势,当它们(从属力量)

威胁到统治力量的稳定时，在这些情况面前，霍尔一直是一个理论家。但通常这些过程都发生在文化领域内部，而且它们包括从属的社会团体——比如年轻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黑人或者亚洲人等——所进行的活动行为。对于霍尔以及我们（20世纪70年代晚期与霍尔共同进行研究工作）中的许多人来说，问题是已经激进化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是怎样与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形成联合的；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对政府正发起挑战。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激进主义和团结的问题，同时，它也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关系到创造学术形式、教学方式和教育空间，让那些缺少机会接受教育和接触学术的从属社会团体得以使用。

霍尔对英国所谓的撒切尔革命进行的分析备受关注，最近他对布莱尔政府也作了分析，支撑这两个分析的基础是霍尔对以下问题的说明——在我们也许会称之为左派的社会民主运动内部，为了使英国新工党重新掌权，那些表面上激进的因素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屈服，并停止了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尽管许多荣耀和赞誉都授予了斯图亚特·霍尔，以及其他拥有相似身份地位的、在上世纪中期来到英国的加勒比海移民，霍尔依然与所谓的英国“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sup>①</sup>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同时外在又内在于英国性的立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对他的批评视野很有帮助，现有情况是左派的激进主义已经衰退，社会民主价值在现代性、实用主义的伪装下也在销蚀，同时，新自由主义得以复

<sup>①</sup> 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指英国的精英阶层。该词由英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1906—1990）最先在1953年8月《新政治家周刊》中使用的，随后该词渐渐流行起来。——译者注

文化研究的用途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苏。霍尔所产生的持续影响还有赖于他的著作对重塑学术界做出了贡献。早期带有风险性的、少有先例的研究课题(比如对黑人青年文化的严肃研究),现在已经被确立为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学系课程的标准部分。同样的,一种信任和团结的姿态,也给年轻女性学者提供了对像大众女性小说、电视肥皂剧和它们的女性观众等主题进行博士研究的空间。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保罗·吉洛伊与我曾经是同学,他的著作在该书中也有所涉及。在伯明翰大学学习生涯的早期阶段,吉洛伊就对关于英国性的设想方式提出了挑战,这些设想是向威廉斯、激进历史学家 E. P. 汤姆森这样的人物提出来的;他不能容忍帝国的存在及其文明化任务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忍受那些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来到英国,并接受英国政府统治的国民们的命运——他们发现自己站在帝国的土地上,却不能享受权利,毫无归属感。就像我在第二章中讲到的,吉洛伊意识到了伯明翰整个城市的日常经济深深地依赖于千万黑人和亚裔,然而校园中几乎全都是白人;这种意识感就是他出色的学术批评历程的背景,这正是我要在该书中予以描述的。

书中涉及到的其他理论家,都没有在伯明翰大学斯图亚特·霍尔的手下进行过研究工作。将他们囊括在此,以及我将他们都纳入文化研究领域,是基于这些大相径庭的理论视野使我们得以更深层地理解文化、多元文化、媒体、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离散艺术(*diasporic art*)以及个人品位和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这类理论家当然还有很多,这里明显有不少遗漏。如果在书中讨论一下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著作,那将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我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她的著作大多数直接涉及文化、文化理论和殖民历史。她的著作确实也涉及到文化